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李英华 著

本书阐述了儒道佛三教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发展。

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的关系，三教与政治的关系。

三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几个核心观点。

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李英华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

ISBN 7-307-05285-7

I. 儒… II. 李… III. ①儒家—研究 ②道家—研究 ③佛教—研究
IV. ①B22 ②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665 号

责任编辑: 舒 刚

责任校对: 程小宜

版式设计: 杜 枚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30×1000 1/16 印张: 23.875 字数: 34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5285-7/B·163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英华，男，1970年生。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海南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 当代思想理论教育前沿问题纵论——赵康太 著

○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李辽宁 著

○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研究——韦勇 著

○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论——张云阁 著

○ 琼崖革命精神论——李德芳 等著

● 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李英华 著

内 容 简 介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本书阐述了儒道佛三教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发展、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的关系、三教与政治的关系、三教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几个核心观念。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对现代教育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为现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现实意义的精神资源。本书各章节的内容既是有机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的论题，能给予读者多方面的思考和启发。

总 序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顾海良

自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历程。在这一个半世纪多的历程中，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此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或者是反对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惠于这一理论的“普照之光”。在这一个半世纪多的历程中，世界上也没有哪一种社会思潮，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密切地贴近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发展的实际。其间，它既经历过凯歌行进的辉煌岁月，也有过经受如磐风雨摧折的艰难时辰，但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以“复兴”的面貌、崭新的姿态、发展的形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马克思主义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显示出强劲的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布下的某种“福音”，也不是什么千古不变的“教义”，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世界文明时代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在走过第一个世纪之交——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时，曾经经受过一次关于它的历史命运的大论争。这次大论争持续了 20 年，后来由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及一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等作了雄辩的实践上的回答；由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最有力的理论上的回答。历史似乎走了一个轮回。在又一个世纪之交——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再

次遇到了关于它的历史命运的大论争。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的事实，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对纷至沓来的社会思潮，人们在对实践的回顾、对理论的反思中，从更广、更深的视界上，思考着马克思主义在它走过第二个世纪之交时的历史命运。

历史总是现实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不只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的历史之路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更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命运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由历史的经线和现实的纬线交织而成的壮观的画卷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现实境遇及未来趋势的思考，也许会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即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世界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依然在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调整自己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点，这也就向世人昭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批判的武器没有失去批判力！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探讨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受到各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还是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探索，都应该是各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指南和重要内容。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也会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同和不同之处。对这些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比较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规律，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五个二级学科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阶层分化和贫富不均等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须研究思想理论教育的前沿问题，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与非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此同时，要加紧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和学科建设，这是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革命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自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寻找救国救民之策，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找到了指引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琼崖革命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世代相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资源，值得永久珍惜。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离不开对现实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治党治国的新方略和执政新理念，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也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

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的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它们对当代中国依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能够对现代教育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博大而深厚的精神资源，而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们相信，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不断推进和创新，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人们会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大学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该丛书从多方面、多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研究，既有对历史和传统的追溯，又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内容丰富，视阈广阔，相信会带给人们新的思考和新的启迪。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的朋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赵康太博士、教授，希望我能作为学术同仁写一些文字。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热情邀请，遵嘱写了以上一些文字，是以为序。

2006年10月于武昌珞珈山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注重自然知识，而侧重于人文精神，这是由儒道佛三教所决定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主导、所支配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儒道佛三教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远非本书所能详述。这里，首先简要说明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儒教、宗法性传统宗教与天祖教。学界提出这三个名词，旨在探讨说明同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土生土长的道教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这种宗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教？按学界以往的主流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目前学界看法有了变化，分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名称探讨说明中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国教的存在。笔者曾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论稿》一书中作了简要述评。这里愿作进一步的探讨。

宗教起源甚早。如果说先民最初只是一种自发性的宗教意识与活动，那么，自夏朝建立以后就转化为一种自觉性的宗教意识与活动，并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有学者指出，在世界古代宗教史上，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不管哪种形式，它们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①“天祖教”就是属于一种无形、无名的国教。所谓“无形”，是指它不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

^① 见何光沪：《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载《何光沪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那样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特定的宗教组织；所谓“无名”，是指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天祖教”的名称，同时，统治阶级也没有明确地宣布这种宗教为“国教”。但这都无碍于天祖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国教这一事实的存在。天祖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和“祭祖”，它的组织形式寄寓于大、小两种传统。大传统就是整个国家的组织系统，它充当了一种天祖教组织的角色。从帝王到各级官吏以及祝巫等神职人员，都担负祭祀的职能。帝王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祭司，他是“天子”。在天祖教传统中，只有属于大传统的天子才拥有祭天的资格。在祭天活动中，天子也可以配祭自己的祖宗。而各级官吏和神职人员，在祭祀活动中只是帝王的陪祭或辅佐，并执行帝王所派遣的祭祀任务。天祖教小传统就是民间的宗族系统。它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能祭天。所以，天祖教的组织及其管理比较特殊。它或者是整个国家组织系统，或者是分散于民间的宗族系统。“天祖教”的祭祀形式在政治和伦理方面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所谓“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祭祖的目的就是报答本愿：敬天必忠君，故忠道得以宣扬；祭祖则重丧，故孝道得以发扬。忠孝之道是宗法等级社会的最根本的伦理规范，所以“天祖教”有着强烈的宗法性、政治性与伦理性色彩。天祖教在中国古代社会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政治环境，故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秩序。它一经产生，就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

值得特别说明，对中国历史上国教的存在问题，牟钟鉴等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充分的论证，只不过，他们有的使用“宗法性传统宗教”名称^①，有的使用“儒教”名称^②。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儒教”和“宗法性传统宗教”，“天祖教”这个

^① 参见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任继愈《论儒教》、李申《中国儒教史》、何光沪《何光沪自选集》等论著。

提法更为恰当一些。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天”与“祖”。“敬天”和“祭祖”就是这种宗教的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根据“佛教”、“基督教”与“道教”等命名习惯，称这种宗教为“天祖教”再恰当不过了。这不仅自身名副其实，而且可以避免“儒教”与“儒学”之间的混淆与争辩。况且，“敬天”和“祭祖”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色，儒家传统不能涵盖整个传统文化，故不宜称为“儒教”。同样，“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个命名也有局限，它着重于一种特征的描述，而未能直接揭示“敬天”和“祭祖”的核心，故不如“天祖教”之命名。由于“儒教”这一名称沿用已久，如贸然用“天祖教”取代它，给行文带来诸多不便。故本书从之。

第二，儒道佛三教的基本内涵。（1）儒教、儒学与儒家。早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先秦社会就已存在所谓“儒”的职业，主要从事礼仪、祭祀等宗教活动。这便是“儒教”的根源。儒教一词自古有之。其涵义主要指儒学，“教”是指儒学的教化功能。现代学者沿用它，但各有所指。笔者的看法是，可以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即天祖教）。但它不同于儒学，儒学不是宗教，儒教与儒学并不相等。儒学是由孔子创建而为历代大儒所继承和发扬的一种人文学说。儒学的精义在于教人做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圣人。儒家有两义，指儒学学派和儒学代表人物，即“儒者”，亦即对儒学身体力行的大儒。如孔孟。古往今来，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不知凡几，但一般不能称为儒者或儒家，更称不上“新儒家”。儒者与学者有别，不能等同。（2）道教、道学与道家。道教是宗教，是由先秦道家、黄老学、黄老道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创建于东汉时期。道学是对道家、道教理论学说的总称。道学的精义在于叫人修真。修真的理想境界便是返璞归真，成为真人。当然，在不同语境中，道学所指不同。如道学也指宋明理学。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道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道家只指先秦道家，广义道家包括以先秦道家为源头和核心的一切学术流派，当然也包括道教。像儒家一样，道家也指道学代表人物。一般从事道学研究的学者也不能称为道家，更称不上所谓“新道家”。（3）佛教、佛学与佛家。

佛教是宗教，佛学指佛教教义，佛家是佛门高僧与著名居士。一般从事佛教或佛学研究的学者称不上佛家，更称不上“新佛家”。佛学的精义在于启人觉悟，觉悟的最高境界便是成佛。据此，佛教也许可称之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因为，佛教教义的精髓在于启人觉悟，而不是叫人迷信和崇拜偶像。^①

第三，儒道佛三教关系与“天人合一”。所谓“三教”，既指儒道佛三种宗教，更指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学说及其教化功能。三教关系一般表现为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的关系。但具体表现各有不同。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儒对于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于儒，有调和无排斥。佛、道之间互相排斥。三教尽管具有不同的教化功能与意义，所谓“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德清《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9），但唐宋以后，儒道佛三教都主张“三教合一”。其内涵主要表现为三教合一于“人”、人的“心性”、人的“实践”（修持）。人及其实践是三教合一的物质基础，而心性之学则是三教合一的理论基础。三家心性之学都强调和突出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那种自觉性、超越性、普遍性和永恒性，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既是回归人性的本原、本体，也是人性的升华和生命的超越。“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本身即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是现实的存在或既定的事实。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

^① 关于儒道佛三家学问，梁漱溟先生曾说：“儒、佛、道三家之学均贵践履实修，各有其当真解决的实在问题，非徒口耳三寸之间的事。不掌握此点，不足以言三家之学。”（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64页）这是精辟之见。但是，自近现代教育模式与学术规范确立以来，对三家之教学与研究大多流于一种口耳之谈，而忽视了实修和“受用”。所以，尽管从事儒学、道学、佛学研究的学者不知凡几，但一般不能称之为儒家、道家、佛家，这是因为儒家、道家、佛家乃儒学、道学、佛学的人格象征，故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担当。区别这一点，对于深入体认三家思想特质与同情理解学者处境都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意味开脱或否定学者应有的担当意识。

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不是完全合一的，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自然物。人具有社会性、意识性和创造性。这种意识和创造具有两重性。如何尽量避免对自然的破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显然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从哲学本体论上讲，“天人合一”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与意义。这个“天”是境界之天、心性之天、本体之天。天与人合于“道”、合于“德”、合于“心”、合于“性”。这种合一既是潜在的，但又是有待自觉和努力去实现的。从肉体上说，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人；但从精神上讲，每一个人都有待于努力地做人，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儒家所谓圣人，道家所谓真人，佛家所谓佛，实际上都是指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佛家说得很精辟，佛与众生，原无差别。迷即佛是众生，悟则众生是佛。^① 所以，一个人的境界高低，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这是儒道佛三教所反复昭示的真理。

第四，儒道佛三教与政治的关系。三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政教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三教需要王权的支持与扶助而得以发展，王权需要利用三教来教化人心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政治对宗教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古代帝王高居于三教之上。即使某位帝王虔诚信奉某一宗教，他也是该教的当然教主。三教要想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争得自己的优遇地位，都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佛道两教及教内各派系为争法统、道统，都要求助于世俗政权。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颇能说明佛教发展对政治的依赖。道教也有类似境遇。帝王对三教的利用总是处于主宰的地位。他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信仰、兴趣和需要给儒道佛三教排列座次。或是儒道佛、或是道佛儒、或是佛道儒，等等，不一而足。当统治者认为宗教有害于政时，就会对宗教加以排斥打击，其中对佛教的打击尤为严重。所谓“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即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帝王外，一般都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认识到，“三教

^① 《坛经·付嘱品》：“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

如鼎，缺一不可”，甚至进一步认识到儒道佛三教的不同功能，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其中，儒教（天祖教）是维护和稳定宗法等级制的国家宗教，佛教宣传“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追求死后解脱成佛，道教注重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不老，乃至得道成仙。这些思想不管对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所以，统治者认为三教殊途同归，所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儒道佛三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存发展，在世界宗教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这与中国古代这种比较特殊的政教关系有着密切关系。

第五，儒道佛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大体可以这么说，儒道佛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儒道佛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广泛渗透、影响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由儒道佛三教所主导、所支配。传统文化教育不注重自然知识，而侧重于人文精神，这是由儒道佛三教所决定的。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已讨论得很多，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里拟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也即从“传统”与“现代”的相对性角度进行简要探讨。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言，如何继承和发扬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应对春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即是孔子当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从文化角度而言，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文化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孔子留给后人的历史遗憾！秦汉之际，如何继承和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以适应大一统之后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秦汉之际政治家、思想家们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先后做出了三次选择，即“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他们的得失成败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两汉之际，佛法东渐。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此别开生面。这个外来文化日后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过程竟经历了五六百年之久！这期间三教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启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魏晋隋唐

时期，佛教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佛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道两教。因此，率先几乎完美地实现了三教合一的，不是儒家，也非道家，而是六祖慧能所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确实值得深思。入宋以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如何回应佛老，便是宋明新儒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所建立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实现了文化的大综合、大创造，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内圣有余而事功不足，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晚清以降，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影响到今日。那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出和考虑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不敢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中，如何面对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即传统文化的现（近）代化问题，就是从那时提出，但直至今日仍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被更加严峻地提到日程上来。如何反省和体认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并引导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我们从历史发展角度回顾和反省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目的在于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当然，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当今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远非古代佛法东渐那么单纯，其内涵与性质都要丰富而复杂得多。但两者总有一定的相同相通之处。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启示！

第六，儒道佛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现代教育取代传统教育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教育日益明显的缺陷：“片面的科技化知识追求掩盖和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内部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裂；造成知识传授（‘智育’）与人格培养（‘德育’）的脱离；以及‘成人’与‘成才’（甚或是‘成材’？）的对立。教育理念在日益强劲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教育策略和办学方针，使得‘智德双修’、‘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严重的

扭曲。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下，教育、尤其是中、高等教育（如所谓中国现行的‘职业高中’、‘技术专业学校’）正朝着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才市场’的压力下，教育也开始企业化、商品化（所谓‘人才工厂’和‘人才产品’），甚至连其知识的传播也变得日益狭隘和片面起来。”^①这是值得忧虑的事情。毫无疑问，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当然，这就要求儒道佛三教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创造性的转化，才能为现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现实意义的精神教化资源。^②

最后需要指出，除了儒道佛之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传统文化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是由政治文化所决定和支配的，或者说政治文化对它们起着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又是由若干核心观念所支配的。基于此，本书主要阐述两大内容：一是儒道佛三教的基本思想；二是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观念。本书写法不同于一般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本书各章节的内容既是有机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的论题。通过这些论题的阐述，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笔者对上述诸问题的一点看法。

李英华

2006年8月

①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2页。

② 必须说明，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管怎样回答上述问题，都只能说是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内容。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诸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人格等价值观念，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不过，另一方面，如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那么，在国民中形成一种努力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共识也显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因为，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